



# 與包曼對話

Conversation with Bauman

/譯者 楊淑嬌

/作者 Zygmunt Bauman  
Keith Tester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 與包曼對話

Dialogues with Hans-Joachim Lauth

譯者 蕭蕭

原書名 *Dialogues with Hans-Joachim Lauth*  
原書作者 Hans-Joachim Lauth

◎ 台北時報出版

# 與包曼對話

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 著  
楊淑嬌 譯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 © Polity Press 2001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與包曼對話／契斯·泰斯特 (Keith Tester)·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 合著；楊淑嬌譯。-- 初版。

-- 臺北市：巨流，2004 [民93]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

ISBN 957-732-207-7 (平裝)

1. 社會學 - 哲學，原理
2. 政治 - 哲學，原理
3. 社會倫理

540.2

93012541

## 與包曼對話

原著：*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

原著者：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譯者：楊淑嬌

封面設計：鄭宇翔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 48 巷 5 號 1 樓

電話：(02) 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010023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 5 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957-732-207-7

2004 年 9 月初版一刷

定價 18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前言

組成本書梗概的對話是在兩千年的春天和夏天進行的。這些對話主要圍繞三個主題而進行。

第一，這些對話讓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有機會簡述深藏在他許多文本背後的一些深層意涵，那些深層意涵已經改變了當代社會思想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的本質。

第二，這些對話希望營造出一種脈絡，讓包曼以較輕鬆的態度闡述他的觀念，並且進而總結一些他論著體系的重要關懷。

第三，這些對話促使包曼省思他文本所擁有的意義，因為這些文本已經離開作者的控制，變得有自己的生命了。

如果本書達成上述目標的任何一個，就是值得稱道的成功了，而且也希望本書因此能鼓勵新一代的社會思想家自己去看包曼的著述，並且找出他們自己的挑戰、看法和靈感。

以最保守的方式來說，包曼的著述非常龐大，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而且，在包曼最為人熟知的英文著述之前，他已經出版許多以他的母語波蘭文寫成的著作，那是他在 1968 年流放之前完成的。如果本書企圖總結並反映包曼所有的論述，那就太愚蠢了。因此，本書大部分關注的是包曼「英語時期」的論述。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對話發生在包曼智識生涯的特別時期，那時他對後現代性開創性的關注被新的方向（他圍繞著「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此一概念的思考）所取代，那時，讓他的論述與眾不同的一些倫理承諾（ethical

commitments) 也透過政治 (politics) 和公義 (justice) 的概念而重新架構。

我必須清楚指出，包曼對我所提的問題沒有施予 (或企圖施予) 任何控制，也未企圖 (他也不希望) 影響我在導讀 (對此，責任完全在我) 中對他的論述的評論。

在我集合而成本書的期間，包曼展現出非比尋常的幽默、友善及溫暖。一如以往，我要感謝他讓我相欠這麼多。我也感謝 Ross Abbinnett、Chris Shilling 和 John Thompson 提供的寶貴意見。

契斯·泰斯特 (Keith Tester)

Polo 說：「生活的煉獄並非來日才會發生：如果存在著煉獄，它早就在那兒了，我們每天生活於其中，它是我們一起創造出來的。有兩種辦法可以逃離煉獄。第一種辦法對許多人而言很簡單：接受它，並且成為它的一部分，那麼你就再也看不到煉獄。第二種辦法需要冒險、需要時時警戒、憂懼：在煉獄當中尋找、並且學習辨認那些不是煉獄的人和事，讓他們能夠延續、給他們空間。」

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 目錄

---

前言	i
導讀	1
對話一 脈絡緣起和社會學的視野	17
對話二 倫理和人類價值	49
對話三 現代性的矛盾	79
對話四 個人化和消費者社會	111
對話五 政治	143
參考書目	175



## 導讀

組織本篇導讀的有用方法將是提出三個問題並且找出答案。包曼是何許人？他都做些什麼？為什麼？不消說，像這樣篇幅的導讀無法對包曼思想的廣度和複雜度投以足夠的關注。而我也不會假裝它可以。本篇導讀的目標不高，它只是想為不熟悉包曼社會思想的人提供一種跨入門檻的方法。閱讀包曼的書並不會讓人感到慰藉，但是它卻會讓你對世界、對你自己，而且，也許最重要的是，你對其他人以及你與其他人的關係，有一層不同的看法。

### 包曼是何許人？

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方式之一是借用別人對包曼論述的評論。有人說包曼是「評論我們人類處境……最有趣、也是最具影響力的評論家之一」。這句是引自 Dennis Smith 所寫的包曼傳記，而且 Smith 也認為「包曼是他所說故事的一部份」(Smith 1999:3)。Smith 的論點是：包曼的書及論文是瞭解我們所住世界的本質的最重要著述之一，而且，包曼是一名對現今重要趨勢及力量的非常敏銳的觀察者，因為他曾以非常深刻的方式經歷過這些事情。

Smith 猜測說包曼許多智識上的關注反映他的生活經驗。這樣的臆測是過度了的，但這臆測的重點確實說得不錯。我們難以想像包曼的經驗對於他社會思想的主題和淬練沒有影響。1925 年，包曼出生

在波蘭一個貧窮的猶太家庭中。1939年9月，他和家人為了躲避納粹入侵波蘭，逃到蘇聯。在那兒，他加入波蘭軍隊並且到蘇聯「東方戰線」(Russian Front)打仗。包曼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開始他的學術生涯，他是華沙大學的教授，他在那兒一直到1968年共黨政權倡導反猶太主義運動、他流亡海外為止。1971年，他成為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社會學系教授，他在那兒一直待到1990年正式退休。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當包曼用英文著述時，他至少是以他的第三國語言寫作的(他在波蘭出生，在蘇聯受教育)。

把包曼的社會思想和他的傳記連在一起是很具誘惑力的。例如，他寫許多有關他的祖國波蘭以及波蘭由共產主義轉變成類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這些主題也出現在他的一些著書中(請參閱，例如，Bauman 1988)。他也寫極權主義以及尤其是猶太大屠殺(Bauman 1989, 1991)。他在後現代性的研究中所描述的流浪漢(vagabond)和觀光客(tourist)也可能被認為是反映自己被迫流亡的經驗(Bauman 1992a, 1993, 1995, 1997)。最後，有人也許甚至會主張，包曼致力研究理應能長久維繫且是超越無常個人偏好的「照顧的倫理」(ethics of cares)反映出他希望重新投入這個只提供旅行住宿的世界(Bauman 1988a, 2000a)。當然，以上所有這些都很具吸引力，但如果我們將包曼——或任何其他社會思想家——的主題和關注化約成傳記問題，那麼，我們至少會面臨三個主要麻煩。

第一，如果說包曼的著述反映他的個人經驗，在邏輯上我們必須將相同的論調用在每個人的著述上。如果我們準備這樣做，到頭來我們必得總結所有的社會思想都是自傳，而且，既然所有的自傳都傾向隱藏某些事件、渲染另一些事件，那麼，所有的社會思想充其量不過

是思想家想說的自己的一些事而已。如果我們仍要繼續朝這種思路走下去，最後我們必須說道德、壓迫、自由、受苦、快樂、歡愉等問題都能完全化約到個人層次，那它們就失去一般重要性（general importance）了。或者，換種方式說，社會思想的真正可能性崩解了，正如（而且更重要的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以某種方式交會的觀念也崩解了一樣。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會像是人類最近黑暗時期的口號一樣，「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第二，如果我們以包曼的傳記來解釋包曼的思想，那麼，我們實際上是讓自己完全無法理解包曼所說的東西。包曼的論述本身已經夠難了，更別說是開始在傳記這種不令人滿意的基礎上，讓解釋包曼的論述變得更難。正如 Peter Beilharz 指出的，包曼「不喜歡談論自己的生命歷程」（Beilharz 2000: 3；以這點而言，本書〈對話一〉所提供的傳記性資料對瞭解包曼的生命和他思想的關聯已經很不平凡、而且也足夠了）。包曼這麼說是為了維持優良的社會學和道德的緣故。包曼非常推崇的 Richard Sennett 已經對這些理由提綱挈領了。在他令人讚嘆的《公共人之死》（*The Fall of Public Man*）一書中，Sennett 主張，現代文化入侵公共生活的程度已經摧毀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界線了。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不會因為人們在公眾前有教養、有禮貌，就說這個人「很好」，相反地，我們想要知道別人的每一件事。公領域的生活被親密的想望取代；不管是對什麼人，我們都要求親密的知識（intimate knowledge），而且要求感覺我們「真的知道」別人的事。別人的私生活和小過失成為我們衡量他們價值的標準。我們專注於別人做了什麼、而不是他們是什麼人。Sennett 說，「在那樣的社

會裡，測試人們彼此間是否真誠和『率直』(straight)的考驗是親密關係市場交換的一種奇特標準。」(1986: 8)。如果我們準備告訴每個人每一件事，我們就會被認為是好人、誠實的人。證實這種觀察的證據到處都看得到：在充斥於白天電視頻道的談話節目中、在安全的已死的人的轟動傳記中、在主宰流行文化的「名人崇拜狂熱」中。但 Sennett 的重點在於，這樣的文化意味公共生活 (public life) 的死亡，因為除了我們的秘密、謊言和干涉別人之外，它剝奪了我們任何共同的東西。因此，包曼的拒絕談論自己只不過是拒絕讓自己身陷於這種遊戲當中而已。那是對該種文化期望以及它加諸在人們身上的代價的實際拒斥。包曼刻意避開自傳，因為唯有那樣，公共生活——它也是能夠成為有原則、受尊敬的政治的基礎的唯一生活——才能獲得支撐、且被實踐。

第三，包曼的妻子珍妮娜 (Janina Bauman) 的傳記才是對包曼社會思想真正很重要的傳記。第一眼看起來，這樣的論調似乎很奇怪，因為它與 Sennett 所教我們的公共生活不需要與個人發生親密性的論點相左 (的確，如果公共生活瓦解成私人的親密性，公共生活就不可能是公共生活了)。但珍妮娜的經驗對包曼的社會思想很重要的聯想和 Sennett 的教導是可以相合的，因為珍妮娜寫的一本回憶錄很顯然對包曼的論述有非常重大的影響。珍妮娜寫的這本回憶錄就是《晨冬》(Winter in the Morning, 1986)，珍妮娜在書中回憶自己在納粹佔領的猛烈攻擊時期，身為一名住在華沙的猶太女孩的經驗。珍妮娜回憶戰前時候溫暖的生活如何被捏成碎片，她、母親和姊妹如何被迫進入華沙猶太區 (Warsaw Ghetto)、以及如何設法逃離被遣送到死亡集中營的命運。

珍妮娜的書在包曼的社會思想中留下印記。正是《晨冬》讓包曼察覺，如果他要研究猶太大屠殺，他將之解讀成是現代性趨勢和可能性的一種結晶，他就必須超越自己的生活經驗。包曼是躲過納粹佔領區的（他在〈對話一〉中提到自己與納粹的照面），因此，他自己的經驗不足以理解大屠殺的問題。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的前言中，包曼寫道「閱讀珍妮娜的書讓我開始思考我是多麼不瞭解——或者說是，未曾適當地思考過〔大屠殺〕。它讓我明瞭我不曾真的瞭解在那個『不是我的世界』中所發生的事」（1989: vii；雙引號內的幾個字在包曼的書中就是用雙引號括起來的，因為那引自《晨冬》的致謝頁）。猶太大屠殺是別人故事的一部份。那麼，顯然地，社會思想的實踐需要我們超越自己的生活，把故事放在更具公共重要性的架構之下（這種論點與包曼在1978年提出的方法論以及充斥在他現代性論述中的倫理論點是相呼應的；這兒說的議題就是，為他人而活）。

總而言之，如果某人要寫自己的傳記，那是一回事。但由別人代表某人來寫傳記又是另一回事，因為那是一種「這是每個人都想要知道」的文化期望。正如包曼自己的身份認同社會學在現代性、後現代性和流動的現代性中所透露的是（Bauman 2000b），道德上嚴格的個人隱私具有一種令人讚賞的尊嚴（正因它總是尊重他人的尊嚴，因此這隱私是道德）。包曼顯示，社會學者的工作在公共領域上是比——或必須比——社會學者私人的生活更具重要性的。具公共相關性並不要求我們在公共領域中必須裸裎相見。而如果現代的期望要求如此，那麼，正如包曼的社會學顯示的，那也許是一種我們必須不計代價抗拒的風潮。屈服於那樣的壓力無異於參與摧毀公共生活，也因此，摧

毀政治。

因此，包曼是何許人？對我們而言，他是一個邀請大家參與公共生活的個人。

## 包曼都做些什麼？

第二個問題問起來很容易，但回答起來很難。答案端賴我們往哪些方向看。如果我們看的是包曼的著書，答案很顯然就是，包曼做的就是極快速地寫作，而且具有驚人的能力將焦點確切放在能夠將現今許多原本各自分歧的問題和議題拉在一起的議題上。在此層次而言，也許可以說包曼進行的是譯寫（translation）的角色。他綜合現在正發生什麼事、什麼是重要的事，並且將之呈現在社會思想家的面前，讓他們能夠因此而自己去進行討論。包曼將世界譯寫成文字。包曼不是系統的建造者，他的社會思想也不在於冷面地挑出一個單一觀念或主題。他是一名評論家，透過他，現今的一切變得有了連貫的感覺。

也許是因為，社會思想的世界終於相信它追趕上包曼了、相信他的著作可由註腳走入主流。諷刺的是，一旦當包曼被以此種角度「釣住」時，學術釣者將只會發現包曼又溜走、到另外一池水中去探索了。因此，如果我們要瞭解包曼都做些什麼，我們應該不是只去看一些「主要觀念」而已。我們必須去看他思想之下更深層的東西。而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將可用較連貫的方式對「包曼所做之事」做出小結。

以大家公認的及以包曼論述的性質來看，包曼做的是社會學。包

曼是一名社會學者——而他也自承是如此——因為，一如他在本書〈對話一〉中所解釋的，他相信社會學比任何學術學科都更能捕捉並擁抱所有的人類經驗。他主張，人類經驗並不崇尚在社會、政治、經濟或詩學之間做清楚的劃分，同樣地，社會學也不推崇那種分野。因此，社會學是一種獨特的學科，而且，許多評論家可能認為是社會學無可救藥的弱點（它傾向從別處摘取觀念，它無法在自己和，例如，政治或哲學之間築起高牆）的事實上正是它最深沈的優勢。

這個主題持續出現在包曼一直以來的思想中。對只熟悉包曼在一九七〇年代末之後所作著書的讀者而言，包曼這種散文體的文章可能比他們預期的要深奧許多，但包曼對社會學的組成和重要性的那種全盤瞭解可以在他一九六〇年代的一篇論文中看到，它主張「要瞭解人類，我們必須將我們所發現的所有事情都兜在一起，同時必須深入人類統一的生命歷程的不同面向」。在該篇論文中，包曼又進一步澄清，「統一的」(unified) 這個詞的用法是特別的、是不同於它慣常的意義。畢竟，「該詞暗示某事在被分裂後又被放在一起；但我們一般對它的想法是，任何分裂發生前就存在的整體」(Bauman 1969: 1)。因此，雖然包曼是一名社會學者，但他是一名特別的社會學者。他相信，如果要尋求一個較能涵蓋一切、且較切題的社會世界的知識，就必須持懷疑的眼光看待、甚至忽略學科的分野。

因此，包曼所做的社會學是處於折衷主義 (eclecticism) 和廣泛性 (catholicity) 的符號之下的。但這不是自我擴大或自我粉飾的折衷主義。人類生活本質上就是非常多元、分歧、而且無法以任何一個單一的標題來涵蓋，正因如此，此種折衷主義才變得是必要的。包曼所說的是，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社會學，以便能負起瞭解男人和女人

生活開放性的艱鉅任務。無庸置疑地，這就是為什麼包曼的研究能夠吸引許多一般稱之為從事「社會思想」(social thought) 研究的人們，以及為什麼他設法讓他的著作超出傳統上所瞭解的較狹義的「社會學」了。

這種對社會學的理解(包曼對他自己所做之事的理解)所含的一項有趣暗示可以解釋本書中的一個刺探性問題。在「對話 1」, 我問包曼, 如果他到一個無人島, 而且只能帶一本書, 他會帶哪一本去? 我以為他會說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或者是齊穆爾(Georg Simmel)的《貨幣哲學》(*Philosophy of Money*)。但是, 包曼卻列出許多文學作品, 而且最後決定帶去的是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所寫的一本短篇小說。這真令人意外, 但以包曼對社會學組成的獨特理解來看, 這是可以解釋得通的。在包曼眼裡, 波赫士的短篇小說所涵蓋的社會學相關東西和社會學洞見與已被接受為「標竿」的社會學文本一樣多。的確, 如果波赫士的一本短篇小說更能以概括性的方式捕捉男人和女人社會生活的律動和開放性, 那麼它可能比任何傳統的社會學書籍要有用得多。不過, 雖然包曼的思想強烈暗示社會學與文學有關連(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常在他的著作中引用文學作品),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不宜將此種關連太過誇大。說了半天, 包曼的著書無可否認地是社會思想的例證。包曼所做的是去思考以及倡導思考男性和女性所經驗的以及面對的關係、情境和力量, 尤其重要的是, 那些他們真正經歷過的。文學可能也能對那些關係、情境和力量提出新的、具挑戰性的觀點(尤其如果那些文學



是像包曼喜愛的一些作家，如 Robert Musil、Milan Kundera、Georges Perec 所寫的那種），但事實上，文學還是建築在虛構的基礎上，而不是經驗上的和社會上的實情。

不過，還有另一個方式可以回答「包曼都做些什麼？」。的確，他「做的」是社會學，但是，在社會學的領域中，他試圖做一些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他的社會學中，包曼試圖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不一定得是今天這個樣子，而且，今日看起來是這麼自然、這麼明顯、這麼無可避免的事情，其實也是有別種選擇方式的。這種想法透露出深刻影響包曼社會思想發展的兩位重要人物的論點：葛蘭西的後列寧馬克思主義和齊穆爾的社會學。這兩位人物如何對包曼產生影響在包曼與 Beilharz 的一篇對話中說的很清楚（見 Beilharz 2001: 334-44）。

在那篇對話中，包曼說葛蘭西教給他的是，男人和女人不是主宰決定每一件事的社會結構下的不會思考的笨蛋，而且，他們（這兒說的是，我們）也不是只有當外在刺激發生時才會反應的人類。相反地，葛蘭西指出，男人和女人自己就是能動者。對於包曼而言，閱讀葛蘭西讓人明白，男人和女人具有為自己建造世界的才能和力量。葛蘭西指出，但因為當前的次序結構所提倡所的「常識」（common sense）讓這種潛能既沒有被看見、也沒有對此付諸行動。葛蘭西讓包曼看到，事情是可以不同的，而且，男人和女人是可以做出別種選擇的。這種影響與包曼認為文化是一種「開創未來的利刃」（a 'knife pressed against the future'）的見解（見 Bauman 1973, 1999a）是非常相合的——而且也是繼續相合的。在這些語彙裏，文化既是瞭解世界上存在著別種選擇的用詞，同時也鼓勵男人和女人以不同方式、